

何以为城:唐宋时期川渝地区筑城活动 与城墙形态考察

马 剑

(西南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历史地理研究所,重庆市 400715)

摘 要:由唐至宋,在不同阶段,王朝对川渝地区州县治所城市兴筑、维护城墙的政策和态度历有变化:唐代前、中期,不重视城池修筑,多沿用旧城;唐末五代,开始大规模建造、补葺城池;北宋初至南宋中期,除徽宗时较重视西、南边地城池的修筑外,其余时间均对城墙修补采取消极态度,任其倾颓,直到宁宗以后才有所改观。对城墙的修筑因时、因事、因地甚至因人而存在差异,以“城墙内的城市”来概括中国古代治所城市的形态特征并不确切。

关键词:城墙;治所城市;唐宋时期;川渝地区;筑城

中图分类号:K9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841(2010)06-0150-09

一、问题之提出

章生道认为,在历史时期,中国人就是一个善于筑墙的民族,屋墙、坊墙、城墙以至长城,各自发挥着保护财产和人身安全、分隔不同族群、保卫中国政治和文化传统等诸多作用。从结构、功能和象征意义来说,在中国文化景观上,以环绕和确定城市界线的城墙最为重要^[1]，“对中国人的城市观念来说,城墙一直极为重要,以致城市和城墙的传统用词是合一的,‘城’这个汉字既代表城市,又代表城垣。在帝制时代,中国绝大部分城市人口集中在有城墙的城市中,无城墙型的城市中心至少在某种意义上不算正统的城市”^{[2]84}。故而,国外学者多将中国古代治所城市称作 walled city(城墙围绕的城市)。马正林虽然认为城墙并不是城市的必备标志,“但是,由于中国特殊的历史环境,多数城市是由官府设立的政治中心而形成的,城墙就成为中国城市的主要标志”^{[3]51}。显然,高厚坚实的城墙、雄伟壮观的城门、规则整齐的马面成为我们对古代城市最深刻的意象和记忆。

然而,以上认识虽然揭示了历史事实的重要方面,但他们所赖以凭藉的历史文献和实地调查依据却略显狭隘和不足。其文献依据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是以明清地方志为中心的官方文献,一是来华的西方人士有关中国城市的记述^{[4]539}。地方志中关于城池、官署等建筑的记载与插图带有明显的价值取向和文化关注^{[5]1-12},会在很大程度上强化甚至诱导人们对城墙在实用性和象征意义上的认知;而高大雄壮的城墙对初来乍到的西方人所产生的视觉冲击也是可想而知的,他们不惜笔墨地描述着这种景观。众所周知,明中期至清代,由于受北方民族的威胁、内部动乱与朝代更替的影响,掀起筑城高潮,补修不断。现今实地调查所能看见的城墙遗迹基本上都筑于这一时期。而对明代以前城墙筑造的认识则主要来源于一些概括性的描述和对都城等重要城市的个案研究,一如严耕望先生所言,概括叙述性的史料,或有夸张之嫌;而例证性的证据则可能只是特例,并非一般现象^{[6]26}。

仅以帝制末期的特征或个案研究的成果来对中国古代的筑城传统作出概括性的结论,颇显勉

* 收稿日期:2010-02-25

作者简介:马剑(1981-),男,四川夹江人,历史学博士,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历史地理研究所,讲师,主要研究中国历史地理。

基金项目:西南大学哲学社会科学博士基金项目“唐宋时期四川地区城市与区域结构研究”(SWU0909307),项目负责人:马剑。

强,很难经得住推敲。斯波义信即指出,用长安、洛阳或北京之类的模式来千篇一律地概括中国的城市,很难做出一般的和正规的城市论、城市形态论或城市生态论之类的研究^{[7]414},因此,中国城市始终为城墙所围绕的观点需要重新检讨。已有学者对此提出质疑认为,在宋、元及明代前中期主要以毁城和不修城的政策为主,在此间,城市没有城墙或者城墙处于颓圮状态成为城市城墙的常态^{[8]145-183}。这一观点基本可以信从,但他是从宏观的全国层面来进行讨论,其结论也略显笼统和绝对。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中,筑城的传统是否始终如一地继承着?不同王朝在对待筑城的态度上有什么不同?筑城活动存在怎样的地域差异?这样的不同和差异是什么原因造成的?由此而对城墙的状态产生怎样的影响?这些问题都需要进行更具体的实证性研究,本文即以唐宋时期的川渝地区为对象来加以考察^①。

二、唐五代时期

大业十三年(617)六月,李渊起兵晋阳,十一月攻克长安,十二月即任命李孝恭为山南招慰大使,经略巴蜀。巴蜀地区的隋朝旧臣、豪族首帅竞相派遣子弟款附,表示归顺,从而使川渝地区较早地以平和的方式归于李唐王朝的统治之下,并在随后作为后方基地支持着统一南方的战争。这样的形势对该地区的城市至少产生两点影响:其一,自从西魏废帝时期(551—553)取得益、梁地区以来,川渝地区保持着较为稳定的局面,没有受到朝代更替时动乱的波及,使大量修筑于南朝及西魏取蜀后的城池免受战争的摧残,得以基本保存。其二,川渝地区较早地纳入李唐版图,并在王朝前期,其中心区域基本处于稳固而有效的管理之下,使统治者对其颇为放心,没有叛乱或割据之忧,从而降低了大规模修筑葺城池的必要性。因此,可以认为,唐初川渝地区并没有大规模地进行城池修筑,只是沿用前代的城墙。如西南地区最重要的城市成都,自隋代蜀王杨秀“因附张仪旧城,增筑西南二隅”之后^{[9]78},唐代前期就没有再进行修筑,其下一次修造已是在近一个半世纪之后,安史之乱爆发,镇守剑南的崔圆为玄宗入蜀避难作准备,“乃增修城池,建置馆宇”^{[10]3279},但后世高骈、张咏等追述成都筑城之事,均未言及,这次所谓的“增修城池”也很可

能只是象征性的。梓州城,乃是沿用南朝刘宋元嘉时所筑的城垣^{[11]841}。利州景谷县城,“本平兴城,杨难当所筑,削山为城,城三角”^{[11]566},也是利用旧城。《唐律疏议》卷八《卫禁》“越州镇戍城垣”条云:

诸越州、镇、戍城及武库垣,徒一年;县城,杖九十。(原注:皆谓有门禁者。)

[疏]议曰:诸州及镇、戍之所,各自有城。

若越城及武库垣者,各合徒一年。越县城,杖九十。纵无城垣,篱栅亦是。^{[12]632-633}

按制度规定,诸州镇戍县皆当“各自有城”,但显然也存在一些没有城垣,只是树立“篱栅”为墙的城市。《唐律疏议》撰于高宗永徽年间,那些没有城垣的城市应当是唐初新建置的州县或者沿用旧城而城墙坍塌者。

文献中所见唐初川渝地区内地筑城的记载仅有一例,《元和郡县图志》卷二十二《利州》载:

胤山县……县城置玄白崖上,武德四年筑,义清县理焉。唯三面有城,皆临绝险,南面因险,不更筑城。

虽然文献中筑城记录的缺失并不表明州县治所的城垣没有被修葺,但有一些事例或可从侧面证明唐代前中期并未着意于四川盆地内部城池的修筑,城垣状况不佳,以致其难以有效发挥军事守御功能。代宗永泰元年(765),剑南西山都知兵马使崔旰率兵攻成都,节度使郭英义“出兵于城西”,与之接战,未几败还,崔旰径直“兵至子城”,郭英义逃奔简州^{[10]3399},此“子城”当指“衙城”,显然郭英义于城外兵败后,并没有以城池为凭藉组织抵抗。大历三年(768),趁崔旰入朝之机,泸州刺史杨子琳率兵北上,轻易就“突入成都”,占据城池^{[13]7200}。其后又有德宗建中四年(783),剑南西山兵马使张拙作乱,袭击成都,西川节度使张延赏也不战而逃,“弃城奔汉州”^{[13]7378}。成都虽然有城,但其城垣因岁久不修,状况显然不佳,在小规模的冲突中也不堪御敌。成都尚且如此,其他城池就可想而知。肃宗上元二年(761),梓州段子璋叛乱,遂州刺史李巨不战而降,时为东川节度治所的绵州也很容易就被攻破^{[13]7113}。又如梁州城,基本沿用汉代所筑之小城,但当肃宗宝应元年(762)党项奴刺入寇时,山南西道观察使李勉也是直接弃城而走^{[10]262}。而最为惨重的损失莫过于南诏侵入剑南内部,“两俘邛蜀,一

^① 由于历史时期的政区建置经历了一个调整演变的过程,本文所指“川渝地区”东起巫山,西至邛崃山脉,北达秦岭,南及长江南岸,约略包括今四川中东部、重庆、陕西南部及甘肃东南部。亦会随着时代变化而略有盈缩。

劫黔巫。城池皆为灰烬，土庶尽为幽冤”^{[14]8430}。文宗大和三年(829)，南诏大举攻蜀，一路攻陷戎州，并“入梓州西(川)[郭]”，一路陷嵩、黎、雅、邛等州，“引兵抵成都，(十二月)庚戌，陷其外郭。杜元颖帅众保牙城以拒之”^{[13]7867-7869}。战争成败，虽有力量多寡等诸多因素，但弃城不保或轻易破城，则显然与城池不修、城垣败坏而难以抗御有很大关系。

唐初，比较重视边地城池的修筑，特别是北方诸边，因受突厥的侵扰，更是大力提倡筑城^{[15]155-227}。剑南道地处西南边区，边境少数民族众多，而西部的吐蕃常有“要蜀川为东府”的企图^{[10]3400}，因此，本道同样担负着御边保境的重要责任。高祖时，任命韦仁寿为嵩州都督府长史，检校南宁州都督，寄治越嵩，《旧唐书》卷一百八十五上《韦仁寿传》载：

仁寿将兵五百至西洱河，承制置八州七十七县……及将还，酋长号泣曰：“天子遣公镇抚南宁，何得便去？”仁寿以城池未立为辞，诸酋长乃相与筑城，立廨舍，旬日而就。

边地筑城，不仅是为了加强对少数民族的控制，也是作为一种汉化的象征和措施，使这些远离王朝统治核心的地区感受到国家的存在和官府的权威。

自太宗时起，吐蕃便频频进犯剑南西部岷江上游诸州县，促使唐王朝强化对西部边境的防御，不但注重对茂、维、翼、松、柘、静、姚、嵩等州县治所城墙的修筑，而且建造大量军镇守捉城以作为屏障。如考古调查发现，嵩州州城(治今四川省西昌市)在唐代筑有周长十余里的土城^{[16]143}。而《元和郡县图志》卷三十二中对这一带的城池多有记述，如：

(茂州通化)县城，累石为城，内实外险，东北二面并累石，南面西面临岸，去地百余丈。

(柘州)仪凤二年置，以山多柘木，因以为名。其城四面险阻，易于固守。

(静州)本汉蚕陵县地，天授元年于此置静州。其城据山，甚险固。

此外，翼州翼宁县本“治七顷城”，贞观十七年(643)，移治七里溪，“其城西枕大江，南面临溪”^{[11]813}。文州，“大历十四年，西戎犯边，刺史拔城南走，建中三年，以旧城在平地窄小难守，遂移于故城东四里高原上”，于姜维故城置^{[11]574}。在大历十四年(779)的吐蕃入侵中，茂州城也受到进攻，

《輿地纪胜》卷一百四十九《茂州·碑记》下载有《张延赏修城记》：

唐大历十四年，吐蕃大下，火焚了郊馆。

兴元元年，张延赏重修，其后别驾大夫修建城宇堡壁雉堞。

这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显然对茂州城壁造成了相当的破坏，但并没有被攻破，吐蕃焚烧了郊外的亭馆而退，随后，城池得到修补。而武德七年(624)因白狗羌内附，于姜维城置维州，“其城甚险固”^{[11]815}，吐蕃累攻不下，后来通过里应外合的方式才取得维州城^①，其险固可想而知；其后，唐王朝夺回此城，并于大中二年(848)修建了子城，“三面悬崖，城高十丈，东西六十五步，南北一百二十步”^{[17]4433}。高宗、武后时期，吐蕃攻势颇大；玄宗时，唐王朝则多主动进攻，上列西山诸城有的是因前代旧城而建，有的是唐代新建，因位于唐蕃冲突的前线，双方在此形成拉锯状态，互有得失，并且又是羌蛮聚居的地方，军事意义益显重要。《元和志》虽成书于宪宗元和之时，但鉴于上列诸城对川渝边境地带的重要性，故而多选择险要之处立城，自唐初开始就得到持续不断的维护，随坏随修，以使城壁完善，城池坚固。

“安史之乱”爆发后，时局动荡，各地普遍兴筑、扩修城垣，特别是许多州府治所城市，更是形成子、罗两重城墙的格局。爱宕元认为，在唐末五代时期，城池修筑频繁，规模扩大，在其所列的《唐代州县城郭一览》表中，标明了筑城年代的州县城有164个，其中有90个是在玄宗天宝以后(不含天宝年间)所筑，约占55%^{[18]451-488}。虽然“安史之乱”并未直接波及川渝地区，盆地内部州县修筑城垣的需求不如中原、长江中下游地区那么迫切，但因有东西川分治和小规模叛乱，故而从肃宗开始，川渝地区州县城池有逐渐兴修的趋势，但真正大规模修筑则是从僖宗时期开始。

如前已述，成都城在玄宗入蜀前夕，象征性地进行了修葺。又如利州城，北周末年，豆卢勣为利州总管，益州总管王谦作乱，《隋书》卷三十九《豆卢勣传》载：

勣婴城固守，谦遣众十万攻之，起土山，凿城为七十余穴，堰江水以灌之。

《元和郡县图志》卷二十二《利州》记之为：

① 《旧唐书》卷四十一《地理四》，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690页。维州城陷于吐蕃的时间，《元和志》、《旧唐书》等记载不一，关于唐与吐蕃对其的争夺，请参阅宓三能：《说唐与吐蕃相争已久的维州城》，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3年第2期。

(王谦)遣益州刺史达奚(堪)[恭]马步十万来攻利州,于子城南北起土山,今大城内东西南北有大池,是达奚(堪)[恭]取土处也。

可见,利州原来只有小城(子城),在北周末的王谦叛乱中,经受了猛烈的攻击,其后,至迟到元和时,利州已修筑起大城(罗城),包围旧城四面,成为内外两重城制。

梓州为东川治所,大和三年(829),南诏北侵,“入梓州西(川)[郭]”,大和五年六月,“玄武江涨,高二丈,溢入梓州罗城”^{[19]934},表明梓州在文宗时也已形成子、罗城。大和九年(836)任东川节度的冯宿鉴于南诏对梓州的破坏,上任后,“完城郭,增兵械十余万”^{[19]5275},补修城池,加强防备。梁州城(兴元府城)在文宗时也已存在两重城墙^{[13]7869},其罗城或当筑于德宗时升梁州为兴元府以后。

唐末,南诏两次大举入侵剑南,接着,王建据蜀,统领三川,其后,又有前后蜀割据,四川盆地内部的城池大多在这一时期得到增补修筑。懿宗咸通年间,南诏又对剑南地区发起一波进攻浪潮,特别是咸通十年(869)至次年初,长驱而北,一路攻克犍为县、嘉州和眉州,一路陷黎、雅、邛州、双流县,再次直抵成都城下,幸得临时加强备战,完善守御,才将南诏兵拒于城外,不克而退^{[13]8120-8157}。此后,成都的城墙工事才真正受到重视。南诏退兵后,“颜庆复始教蜀人筑壅门城,穿堑引水满之,植鹿角,分营铺”^{[13]8158},以加固旧城。僖宗乾符二年(875)正月,高骈被任命为西川节度使,六月,即以墙垣湫隘、城小难守,上表请筑罗城以御敌保民^{[14]8428}。自次年八月始,至十一月成,“每日一十万夫,分筑四十三里,皆施广厦,又砌长砖……役徒九百六十万工,计钱一百五十万贯”^{[14]911},可见城墙已经以砖包砌,工程巨大。

此外,简州城也在乾符年间进行了修葺^{[17]4308}。而随后从僖宗中和年间开始,便是川渝地区方镇势力间的相互攻伐,各势力(政权)间为了自保而纷纷加固城垣、修建罗城。

僖宗末年,王建攻西川节度使陈敬瑄,“建以成都尚强,退无所掠,欲罢兵,周庠、綦毋谏以为不可,庠曰:‘邛州城堑完固,食支数年,可据之以为根本。’”^{[13]8379}可见,邛州城池甚为牢固。朝廷因王建之请,“割邛、蜀、黎、雅置永平军于邛州,以建为节度使”^{[20]28},但因当时这些州并不为王建所有,节度之职只是虚授。事实上,在王建围攻西川诸州数年的过程中,虽然“大掠西川,十二州皆被其

患”^{[13]8377},但几乎所有州城都是因守城将领投降而取得的,城池并没有被武力直接攻破。

而自光启三年(893)底顾彦朗、王建联兵五万攻成都,其间战事不断,“环城烽堑亘五十里”^{[13]8415},固守近四年之久,直至大顺二年(891)城内粮尽,陈敬瑄、田令孜开城门,携牌印出降。而彭州更是直至乾宁元年(894)五月,因内外都指挥使赵章出降,王建军队才得以登城而入^{[13]8455}。可见,西川诸州的城池已非南诏“两俘邛蜀”、一路势如破竹直抵成都时可比,显然都有城垣的庇护,于僖宗之时得到整修,并在抵御王建的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从僖宗后期至孟蜀初期,川渝地区先后有方镇混战、两蜀交替割据,这段时间是筑城的高潮。如王建在大顺元年九月占据邛州后,即行“缮完城隍”^{[13]8405},补修受到破坏的城池。天复四年(904),王建受封为蜀王,又展拓成都子城西南^{[21]406}。《輿地碑记目》卷四著录有《唐眉州创罗城记》,为大顺三年卢极撰文,据《十国春秋》卷四十《山行章传》载:

山行章……唐末官眉州刺史。州旧无罗城,行章合五县之力城之,周遭八里有奇,名曰卧牛城。

行章于龙纪元年降于王建,则筑眉州罗城当在此之后。前蜀永平元年(911),岐王李茂贞进攻山南,蜀将“步军都指挥使王宗綰城西县”^{[13]8745}。后唐明宗继位后,西川节度孟知祥和东川节度董璋均有割据之意,孟知祥于天成二年(927)至三年又修筑加固成都罗城,并在城北部加筑羊马城^{[14]9310},以备御朝廷军队的讨伐和东川节度使董璋的袭击;为了抑制董璋的势力,朝廷又分割东川属州建立节镇,“使武信节度使夏鲁奇治遂州城隍,缮甲兵,益兵戍之”^{[13]9037};而长兴初,赵季良从东川归来后,向孟知祥报曰:“(董璋)训练兵师,完葺城垒”^{[22]288}。可以想见,在那样错综复杂的争夺中,修治己方城池以作为攻守之资已成为一股潮流。

如前已述,自唐中期以来,益、梁、梓、利、眉等州城已修筑了罗城。而在唐末五代十国时期,因人口增加、方镇兵兴,川渝地区有更多的城池修筑起外围的罗城,形成子、罗城的双城形态。《輿地纪胜》、《方輿胜览》中记载不少城池具有子城;《永乐大典》卷二二一七《江阳谱》载有泸州子城;《夷坚志》“丙志”卷四记有阆州通判之子登子城一事。而由于宋代在川渝地区的筑城态度(详下节),除了上面所提到的之外,其余子城当是唐末五代时期所建而保存下来者。

三、两宋时期

唐末五代时期方镇割据、尾大不掉，各政权、势力间往往据城自守，相互对抗，因此，北宋统一后，统治者不但采取收夺兵权、取消支郡等一系列措施来削夺地方权力，加强中央集权，同时，还大量拆毁江淮地区的城池^{[23]1342}。

宋太祖乾德二年(964)十一月，王全斌等率兵五万伐蜀，至次年正月，孟昶即“上表请降”，后蜀灭亡，仅用76日，“何其易也”^{[24]146}。取蜀之易，使得宋朝统治者一开始并不以蜀地城池为意，因此，除了在后蜀北部的攻守中，部分城池可能受到破坏以外，在平蜀后，我们并没有看到入蜀将领有毁城的举动。

然而，在平蜀后至真宗咸平初的30余年时间里，川渝地区就发生了包括全师雄兵变及李顺、王小波起义在内的十多起事件，若干州县被占据，因此，在平定叛乱后，也曾有过平毁城池的诏令，但因川渝地区邻近边疆的特殊性，并没有执行。如淳化年间李顺、王小波起义及咸平年间王均兵变之时，都曾攻占成都等州县，叛乱平定后，曾下诏要求知益州的雷有终等人“详度毁本州羊马城濠利害”，意图去其城池之固，评估拆毁或保存的利弊。雷有终及转运使马亮回奏认为：

窃以郡国城隍，其来久矣，盖所以聚民而防他盗也。本州顷岁李顺之乱，贼自外攻，即日而陷，此城池颓圮之致也；去岁王均之叛，奸由内作，经年自固，此城池完葺之咎也。然而理乱之事，虽系于人，亦关冥数，诚非常情所可预测。况此城顷因蛮寇，民受涂炭，至唐天成三年，节度使孟知祥遂谋创筑。若缘军贼，诚合去除，又虑异时寇盗外攻，请仍旧不毁。^{[24]1058}

朝廷从其所请。不仅成都羊马城因之得以保存不毁，而且我们也并未看到巴蜀地区有如同江淮一样的毁城活动，官员的奏论中也强调“江淮诸郡”，则宋初的拆城之举仅在长江中下游一带实行，并没有波及川渝地区。

北宋前期的王禹偁曾提及，李顺、王小波之乱时，“西川止益、梓、眉、遂有城可守”^{[23]1342}，有学者据此认为，当时川渝地区的城市多无城墙^{[8]148-149}。事实上并非如此。兹举数例：

淳化二年(991)七月，“嘉州江涨，溢入州城，毁民舍”^{[25]1363}。

淳化中，李顺等南下攻陵州，“当时实以知军州

事张亶能率其众，共力御之，既为完城，遂不污贼”^{[26]288}。

淳化五年五月，李顺余党“数万围阆州，(卢)斌领千兵赴之，斩首五千，围遂解。又至蓬州老鸦山，贼众三千为阵拒斌，斌击败之，至城下，贼复大集，斩三千级”^{[25]10140}。

淳化五年，“延平石侯某尝筑斯(指绵州)城”^{[27]361}。

真宗咸平三年(1000)正月，王均叛乱，“进攻绵州，旬日不能下，趣剑门。先是，知剑州、秘书丞李士衡度寇必至，城不能守，悉徙官帑保剑门”^{[25]9457}，可见绵州、剑州均有城池。

可见不少城市均有城。唐末五代时期才大规模兴修了城垣，蜀地显然并非没有城池，只是从孟昶时，耽于逸乐，城工荒废，赵宋灭蜀，亦不着意于城池补葺，因此不少城墙因年久失修而倾颓，状况不佳，难以守御。

从前面雷有终等人的上奏中可以看出，对于川渝地区城市城墙的态度，治蜀者处于拆或存、废或修的两难境地：如果城池倾颓，一旦有变故，则官军无以自守；若城垣完固，而祸生肘腋，则成为敌方负隅抵抗的凭藉。最终，北宋统治者对旧城采取了一种不修不毁、任其发展的中立政策，对城墙修筑持消极态度。《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十二“太宗至道三年”载：

九月丙子，上因言西川叛卒事，辅臣或曰：“蜀地无城池，所以失其制御。”上曰：“在德不在险。倘官吏得人，善于抚绥，使之乐业，虽无城可也。”

宋太宗强调官吏治理对于维护川峡地区稳定的重要性，甚于坚城高垒。因而，宋朝政府在任命川峡四路官员的问题上常感为难，格外谨慎，颇费思量，特别是对于被称为西南巨镇的成都府，“凡选建师长，必一时名德，中外皆曰可”之人才才能胜任^{[28]339}，且对治蜀有方者多次任用。后来任职成都的张咏、田况、赵抃等均为当时之名臣。“在德不在险”，重视人治而忽略城防，也就大致奠定了北宋一代川峡四路大多数地方疏于城墙修缮的基调。而且，由于川峡四路原为两蜀割据之地，地位特殊，北宋朝廷对其地的分离倾向一直着意防范，因此，“守益州者以嫌，多不治城堞”，以免引起猜忌^{[25]9756}。而自王均之乱以后，宋廷采取措施改善对川峡四路的统治，使川渝地区保持了较为稳定的局面，更无修筑城池的动力和必要。

黄宽重先生认为：“宋廷在依智高之乱后，也改

变对江南不筑城的政策，开始修筑城池，强化守御效果。”^{[29]186} 依智高之乱虽与蜀地无涉，但却刺激了赵宋统治者对川峡地区所抱持的戒备之心，引发一场筑城风波。依智高于仁宗皇祐元年(1049)起兵攻掠广南西路，皇祐五年失败后逃往大理。孟知祥据蜀和李顺、王小波变乱均在甲午岁，而皇祐六年正值甲午之岁，故而蜀地人心躁动，恐依智高自大理入蜀为乱。

转运使摄守事，西南夷有邛部川首领者，妄言蛮贼依智高在南诏，欲来寇蜀。摄守妄人也，闻之大惊，移兵屯边郡，益调额外弓手，发民筑城，日夜不得休息，民大惊扰，争迁居城中。^{[30]450}

朝廷也派戍守陕西的军队运送大量兵器入蜀，以备不虞。上文中所说的“摄守”乃是高良夫，在皇祐六年初，程戡离职而张方平还未到任时暂行职事。他并非“妄人”，只不过是执行诏令而已。

(仁宗皇祐五年八月)戊午，诏益、梓路转运司渐修诸州军城池，毋致动民。言者谓蜀之城池，久废不治，甲午再乱，不可不豫为备也。^{[24]4230}

皇祐五年，知益州的程戡之所以敢“不以为嫌”而“完城浚池自固”^{[25]9756}，并且在完工后受到奖励^{[31]474}，也当是因有此诏令。随后，新任知州张方平入蜀，认为大理去蜀既远，道路险阻，依智高难以大肆举兵寇蜀，并捕获传播此消息的邛部川译人，最后“归屯边兵，散遣弓手，罢筑城之役”^{[30]450}。

此次风波虽属虚惊一场，只有成都城池得到一定的修缮，其余诸城的修葺都还未进行，但由此也可以看出北宋对于川峡地区城池修筑并不着意，只是在有事之时临时兴工而已。因而城堞废坏不修成为常态，北宋中期，梓州永泰县人文同曾官于洋州和兴元府，他在上奏中描述洋州的情形：

城池庳漫，全不如事，不知几年天裂为此。

茅草累土，宛若鼠戏，缺漏颓落，殆不可睹。奸庸取罪，常在跳越，仓库所寄，仅同空旷。^{[26]282}

而被他称为“奥区”、“剧地”的兴元府城“纵广亡虑二十里，庳薄毁陷，久不营葺，奸窥盗越，易如短屏”^{[26]285}，其状况也不容乐观。尽管如此，但他乞请增葺城池的要求很可能并没有得到朝廷的应允。北宋末，李新对于潼川府(梓州)城的状况也颇感忧心：

潼川城废圯，久不治，守土吏未尝过而问焉。元丰中，吴几复苟完之，又四十年矣。风雨剥蚀，土漫泞不收，断裂洼凹，癯瘠骨立，其存者数板，若长蛇蜿蜒，折脊异首，尾封豕病，惫莫能兴。云屯阵马，破碎离坎，不复合。人超踰不知有限禁，负贩小盗，出入犹阡陌。^{[32]522}

像兴元府、潼川府这样的重镇尚且如此，更遑论其他普通州县。如成都府新繁县，在熙宁时亦是树栅为垣^{[31]571}。这种因久不修治而使城垣倾颓的现象在某些地方甚至一直延续到南宋中期。

熙宁、元丰之际，河北西路提点刑狱丁执礼上书请修完各地城池，当时也曾“诏诸路修城”^{[33]7442-7444}，并且颁布了修城法式^①，但依当时形势来看，很可能只在北方沿边诸州得以实行。而对于西南边城的修筑也不太重视，多沿用旧城而略加修治。如南面的泸州，因旧城失修圯毁，“仅设篱寨。皇祐二年，始易以木栅”，次年，判官蔡充请求添筑城壁，起盖舍屋，但转运司以其地沙土浮散难以修筑，且虚耗工材为由加以制止。而元丰二年(1079)，因乞弟进犯梓州路，才诏“修遂、戎、泸州城”^{[24]7218}，但这次修城的规模很可能也并不大，以致在南宋时编纂的泸州地方志《江阳谱》中并未提及。直至元丰六年，才加以展筑，但也只是维修土城，仍于其上植木栅^{[34]629}。西南面的雅州城，“只以木为寨栅”，至“熙宁中，朝旨下俞充，按视成都路接近蛮夷州军寨，充乞修筑雅州城”，但奉使回奏的吕陶“只乞修完木栅，自可防虞”^{[35]686}，并没有大规模兴修。西面的茂州“旧无城，惟植鹿角。蛮人屡以昏夜入茂州，剽掠民家六畜及人”，可见其旧城已基本丧失防御功能，至熙宁末，才修筑城池，周八百余步^{[36]252-253}。

北宋人李新曾质疑朝廷只知备西北而不备西南的政策^{[32]558}，宋廷之所以不重视川渝内地甚至边地城池的修筑，原因有五：其一，宋初弃大渡河以南、以西及岷江上游诸地，在西南边疆地区采取收缩政策，减少了与周边少数民族的冲突。其二，当时大理国与赵宋的关系较为融洽，而吐蕃也处于王室分裂、社会动乱的状态，不再像唐代一样对川渝地区造成威胁。其三，宋朝在处理与泸夷、羌蛮等周边少数民族的关系问题上小心谨慎，采取购买蛮

① 李新《又进修城图节略状》中称，重和时修筑潼川府城是“依按元丰城隍法式，无毫发差戾”，可见元丰时曾颁布修城法式，要求各地依式兴筑。参阅李新，《跨鳌集》卷十三，《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一一二四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504页。

夷马匹、公正处理汉夷纠纷、改善夷人生活等绥抚措施,以保持边境安宁;而当发生入侵变乱时,则果断地派重兵予以镇压,保持相当的武力优势。其四,边区一带地瘠民穷,若修筑城池,势必于当地及邻近州县大兴力役,可能招致少数民族的戒心和反抗^①。其五,修筑城池所费巨大,而宋初收夺州军财权的诸措施使得州军长官对本地财赋的支配权受到限制,“有城郭甲兵之费,必以控于转运,往往滞吝不予”,致使“封疆之吏无所于告,则城坏弗(著)[葺],兵阙弗治”^{[27]369},一些城池的修筑请求即是在转运司勘会之后,“谓徒费而止”^{[34]629}。

北宋末至南宋初,一些城市的城墙陆续得到修筑,但其原因却并不相同。

北宋末年,徽宗好大喜功,开疆拓土,务广虚名,对于纳土归附的周边部落多设置州县,筑城以守,“昔所入贡者,今必城为郡县”^{[25]11034}。如通化军,政和三年(1113),因董舜咨纳土而筑军城;延宁军,政和六年,汤延俊等纳土,亦建军城^{[25]2214}。但随后又因得不偿失而大事省并,并且因治理不善,加剧了与蛮夷的冲突,使边城备受威胁。原来只有土城木栅的泸州,于徽宗大观、政和年间进行了大规模修筑:

大观元年,始令仿泗州规模,濒江用石垒砌,就上筑城,修建楼櫓,令转运使乔方应副营造。二年更命赵适,然未暇兴役。政和五年,又以诏郡守康公师鲁,……立限修筑……其东濒江以石砌堤筑城……其三面并筑土城……周城之基,得六里三百三十八步……于是郡城始周而固。六年,孙公又乞以所余三万缗别帑藏之,以为来者修葺之备。有旨从之。今谓之修城库。^{[34]630}

随着大规模开边纳土的进行,对边地的管理职责也相应加强,地处南部的泸州的重要性日增,以便于抚驭泸南诸蛮。但泸州仅以土墙、木栅为城,“城壁非壮丽,何以守御且示威蛮夷”^{[34]630}?因此,为了强化武备而兴修城池。

梓州因为“南控泸叙,西扼绵茂,江山形势,据

四川之胜,水陆之冲,为剑外一都会”^{[33]7426},于重和元年(1118)升为潼川府,地位亦重。升府当年即以旧城为基础,修筑剥蚀坍塌的城墙^{[32]503-504}。潼川府城的修筑是由泸南安抚使庞恭孙具体负责筹划的,于此可以看出以潼川府为泸州后备的意图。

“靖康之变”后,徽、钦二帝被俘,高宗南逃,形势骤然紧张。南宋建炎元年(1127)九月,“诏成都、京兆、襄阳、荆南、江宁府、邓、潭州皆备巡幸,帅臣修城垒、治宫室,漕臣积钱粮”^{[37]225}。知成都府卢法原即行修筑罗城,至次年二月完工,“城周二十五里三百六步,高二丈二尺,广二丈八尺,用工四十六万有奇”^{[37]292}。这次修城乃是在非常时期为高宗巡幸作准备,虽然最终以杭州为行在,但在南宋前中期,成都作为川峡四路的重镇,又常为四川安抚制置司治所,诸军凡十余万,皆其统御,职任即重,其城池也就得到重视,修补不断:绍兴中,四川安抚制置使李璆因旧城多毁圮而加以修筑^{[25]11655};绍兴二十九年(1159)五月至次年十月,王刚中又修葺成都罗城四千六百余丈,完工后还置壮城卒负责日常巡视维修^{[31]570};淳熙初,范成大帅蜀时亦加以营葺。

绍兴六年,针对诸州城壁倒塌失修,壮城人兵违法他役的情况,朝廷下诏要求各州军,如有损坏,而用功不多,则即时修治;如难以自行整葺,则将需用工料、人夫上报,以便安排修治^{[33]7445}。成都因地位特殊,故而城工之事,备受关注。“自建炎南狩,国之守在淮汉,而蜀居江之上游;绍兴西征,蜀之守在利路”^{[27]361},从绍兴时起,川陕地区也成为主战场之一,金军曾攻破金州、洋州、兴元府,因而北面秦岭以南的诸州县当因防御金人的需要而完善城垣。但川渝地区内地州县并不处于抗金前线,因而除泸、夔等少数州县外^②,大部分城池当仍未受到重视,延续着北宋以来的颓毁状态。南宋人魏了翁描述他的所见:

少长从仕郡国间,问所谓城,则凸不满数尺,足可蹴而过,手可俯而攀。贾牧之所挑挞,犬豕之所躡蹂,曰:“此城也”……问诸故老,按

① 如熙宁间吕陶阻止雅州筑城,即是因“雅州地瘠民贫,岂有余力可以具办,不免于户上科定,及近里州县置买应副。若城壁坚完,已见骚动……乞下铃辖、转运、提刑司相度寝罢,庶使公家无横费之害,远民免劳役之苦”。参阅吕陶:《净德集》卷四《奉使回奏十事状》,《丛书集成新编》(第六一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5年,第686页。

② 如泸州城,“绍兴十五年,冯公懋再请修筑,其东偏自南之北五百八十五丈,悉以石甃土以避水患,其三面如故,而改筑广于旧城二里四十步,通为九里一十八步。改建楼櫓,鼎新雉堞,岌然周遭,雄壮甲两蜀。”(《永乐大典》卷二二一七《江阳谱·城池》,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630页)。又如乾道初,知夔州的王十朋也补修城池,其《修垒》诗曰:“莫将逆旅视居官,直作吾家活计看。墙壁时时为修葺,安知劳苦是平安”,自注曰:“夔城颇恶,予修之,虽雉堞一新,然土城易坏,兵有守城者勿它役,随坏而补,则城当固矣。”(王十朋:《王十朋全集》“诗集”卷二十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371页)

诸史牒,则曰:“所从来久矣。”^{[27]357}

魏氏为成都府路邛州蒲江县人,少学于家,曾于蜀中之嘉定府、汉州、眉州、潼川府等地为官,其所言当是川峡诸路的情况。他也曾提及绵州城,自淳化五年修城后,“阅二百三十年间,莫有继者”,以致“颓墉坏堑,若有若无,三尺之童牧可挑达而踰也”^{[27]361}。

宁宗时,宋将变乱,金兵南掠,川峡地区的防御和安全形势进一步恶化,各州县均开始重视城墙修治。

叙州城:庆元元年(1195),“荔枝、甘泉、朝天、奉恩、莲华五门,计城九百四十二丈五尺……诏令支拨钱引一万贯,仍委丁逢措置修筑”^{[33]7471}。

遂宁府城:嘉定八年(1215),魏了翁“具奏乞修城郭备不虞……增埤浚隍,如待敌至者”^{[25]12966}。嘉定十二年,李埴“兄壁镇遂宁,亦修城,复夏鲁奇旧迹,役费倍数十。非修也,筑新城也”^{[38]196}。

潼川府城:嘉定十二年,“张福叛……将及潼川。李公埴初命为牧,即疾驰至……修城……城尽甃巨石,创甕城县门,敌牕蔽膝,并应程法”^{[38]196}。

绵州城:“昉于(嘉定)十三年冬十一月庚戌,讫于明年夏四月癸未,城成。”^{[27]361}

江安县城:县城城楼岁久倾颓,因“壤地接边”,嘉定十五年,“权县令阎师古改筑四门,建楼其上”^{[34]631}。

普州城:宁宗、理宗之际,虞叔平“守普也,缮馆城郭,皆为一新”^{[27]429}。

宋末元初所绘的《蜀川胜概图》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永康军城门、成都城门、眉州城门等与城池相关的建筑^[39],虽然绘画可能有写意的成分,但或亦可表明这些城市的城墙处于较为良好的状态。《舆地纪胜》与《方輿胜览》成书于南宋末,基本上可以反映宁宗、理宗时期的情况。两书中保存了大量与城池相关建筑的记载,如城墙、城门等,由此可以看出,此时川渝地区的城池基本都得以修筑,为城墙所环绕,具备较好的面貌。但从理宗淳祐时起,为了抵御蒙古军队的进攻,宋朝在川渝地区,特别是潼川府路和夔州路兴修了大量山城,构建起山城防御体系,将州县治所迁于其中,此为战争状态下的临时措置,本文暂不详论。

四、结 语

综合以上分析可以认知:(1)唐五代时期川渝地区内部的筑城活动可以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在唐代前、中期,由于较早纳入王朝版图而且局势比较稳定,多数城池的修筑并没有受到重视,只是沿用

前代的旧城;而到唐末五代之时,因防御南诏的需要及藩镇势力兴起并相互攻伐,城墙的功用凸显出来,大量城市开始修造城池,拓展城市规模,建造罗城。与北方大规模筑城始于安史乱后不同的是,川渝地区在肃宗以后只有少数城池得以修葺,筑城高潮则是从僖宗时开始。而在四川西部边境,因面临强大吐蕃的威胁,这一带的城墙修筑自始至终都受到重视,修补不断。(2)宋初虽然没有在川渝地区施行毁城政策,但对城墙修筑、补葺基本采取消极态度,任其倾颓,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南宋中期。其间只是在徽宗之时比较重视西、南边地城池的修筑,但这只是徽宗个人好大喜功的缘故,并不代表王朝总体政策的转变。直到南宋宁宗时,因安全形势的恶化,诸多城市才修治城垣,改善城池失修败坏的面貌。

城墙是对城市外部轮廓的界定,是中国古代城市形态研究的重要内容。“城市”与“城墙”在认知概念上的高度重合,使我们可能过高估计城墙在中国历史上所扮演的角色和发挥的作用。事实上,我们这个“筑墙民族”对城墙修筑传统的继承并非一以贯之,而失修颓坏的城池轮廓,也有异于传统观念中高耸坚固的城墙形象。本文较少涉及城墙所具有的象征意义^[40],而主要从城墙的政治、军事实用功能方面进行探讨,但足以说明:在不同时期,州县治所城市城墙的修治状况并不相同,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因时、因事、因地甚至因人(主政官员、地方士绅等)而存在差异,城墙并不总是中国古代治所城市始终受到重视的部分和最为显著的标志,以“城墙内的城市”概括中国古代治所城市的特征,至少是不完全准确的,它既不适用于所有历史时段,也不适用于所有治所城市。而树栅为城和倾圮的城池如何发挥城乡分野的功能,如何起到在视觉感官上突显国家存在、官府权威的作用,如何满足传统礼制规定对城市外部形态的要求,特别是在唐代,在这样的城垣状态下如何建立并施行封闭式里坊管理,对这些问题的深入探究将增进我们对中国古代城市变革及与之相关的政治、经济等诸多问题的理解。

参考文献:

- [1] Sen-Dou Chang. Some Observations on the Morphology of Chinese Walled Cities[J].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1970, 60(1).
- [2] 章生道. 城治的形态与结构研究[G]//施坚雅. 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 叶光庭,等译. 北京:中华书局,2000.
- [3] 马正林. 中国城市历史地理[M]. 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 1998.

- [4] 鲁西奇. 山城及其河街:明清时期郾阳府、县城的形态与空间结构[C]//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 历史环境与文明演进——2004年历史地理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 [5] 范德(Edward L. Farmer). 图绘明代中国:明代地方志插图研究[G]//张国刚. 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二卷. 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0.
- [6] 严耕望. 治史三书[M]. 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
- [7] 斯波义信. 宋都杭州的城市生态[G]//唐晓峰,黄义军. 历史地理学读本.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 [8] 成一农. 宋、元以及明代前中期城市城墙政策的演变及其原因[G]//中村圭尔,辛德勇. 中日古代城市研究.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 [9] 张咏. 张乖崖集[M]. 北京:中华书局,2000.
- [10] 刘昫. 旧唐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75.
- [11] 李吉甫. 元和郡县图志[M]. 北京:中华书局,1983.
- [12] 刘俊文. 唐律疏议笺解[M]. 北京:中华书局,1996.
- [13] 司马光. 资治通鉴[M]. 北京:中华书局,1956.
- [14] 董诰. 全唐文[M]. 北京:中华书局,1983.
- [15] 程存洁. 唐代城市史研究初篇[M]. 北京:中华书局,2002.
- [16] 凉山彝族自治州博物馆. 四川西昌一号墓发掘简报[G]//《考古》编辑部. 考古学集刊:第三集.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
- [17] 王象之. 舆地纪胜[M]. 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5.
- [18] 愛宕元. 唐末五代期における城郭の大規模化——華中、華南の場合[G]//愛宕元. 唐代地域社会史研究. 京都:同朋舍,1997.
- [19] 欧阳修,宋祁. 新唐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75.
- [20] 张唐英. 蜀檣机校笺[M]. 成都:巴蜀书社,1999.
- [21] 黄休复. 茅亭客话[M]//宋元笔记小说大观:第一册.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 [22] 何光远. 鉴诫录[M]//丛书集成新编:第八六册. 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5.
- [23] 赵汝愚. 宋朝诸臣奏议[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 [24] 李焘. 续资治通鉴长编[M]. 北京:中华书局,1995.
- [25] 脱脱. 宋史[M]. 北京:中华书局,1985.
- [26] 文同. 新刻石室先生丹渊集[M]//四川大学古籍所编. 宋集珍本丛刊:第九册. 北京:线装书局,2004.
- [27] 魏了翁. 鹤山先生大全集[M]. 上海:商务印书馆,1919.
- [28] 傅增湘. 宋代蜀文辑存[M]. 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
- [29] 黄宽重. 宋代城郭的防御设施及其材料[G]//黄宽重. 南宋军政与文献探索. 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0.
- [30] 苏轼. 苏轼文集[M]. 北京:中华书局,1986.
- [31] 扈仲荣. 成都文类[M]//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一三五四册. 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
- [32] 李新. 跨鳌集[M]//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一一二四册. 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
- [33] 徐松辑. 宋会要辑稿[M]. 北京:中华书局,1957.
- [34] 江阳谱[M]//永乐大典:卷二二一七. 北京:中华书局,1986.
- [35] 吕陶. 净德集[M]//丛书集成新编:第六一册. 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5.
- [36] 司马光. 涑水记闻[M]. 北京:中华书局,1989.
- [37] 李心传.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M]. 北京:中华书局,1956.
- [38] 叶适. 叶适集[M]. 北京:中华书局,1961.
- [39] 蓝勇. 宋《蜀川胜概图》考[J]. 文物,1999(4):54-58.
- [40] 鲁西奇,马剑. 空间与权力:中国古代城市形态与空间结构的政治文化内涵[J]. 江汉论坛,2009(4):81-88.

责任编辑 张颖超

Were City Walls Essential for Ancient Chinese Cities?

——Research on the Wall-Building Activities and Urban Morphology in Sichuan and Chongqing Regions in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MA Jian

(Institute of Historical Geography, 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715, China)

Abstract: The policies on constructing capital cities in Sichuan and Chongqing regions had been changed from the Tang Dynasty to the Song Dynasty. In brief, the government didn't attach much importance to building walls surrounded around the capital cities in the early and middle Tang Dynasty. The walls of most capital cities were newly built or rebuilt in late Tang and Five Dynasties. The government assumed a passive attitude towards the city wall construction during the Northern and Southern Song Dynasty. In sum, these policies differed according to time, situation, place and magistrates, and the opinions that consider tradition Chinese capital cities the walled cities was not strictly accurate.

Key words: city walls; capital cities;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Sichuan and Chongqing regions